



财经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ISSN 1000-176X, CN 21-1096/F

《财经问题研究》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经济思想转型与经济学的早期本土化——基于《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考察

作者：缪德刚

网络首发日期：2022-08-02

引用格式：缪德刚. 经济思想转型与经济学的早期本土化——基于《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考察[J/OL]. 财经问题研究.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21.1096.F.20220801.1438.002.html>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经济思想转型与经济学的早期本土化

——基于《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考察

缪德刚^{1,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国富论》，不仅是近代学者了解外国经济学说的窗口，也成为他们反思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对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富论》早期在华传播对国人起到了一定的经济科学启蒙的作用。近代中国学术界围绕《国富论》的思想来源和所涉中国经济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与回应。其中涉及的中文经济学表述术语的使用与规范、中外经济思想的解读和比较，以及从经济学理论视角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科学化转型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国富论》体现了斯密经济思想的时代局限性，但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在中国的早期形塑，推动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与学术体系构建。

[关键词]《国富论》；经济科学；学术体系；经济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F093；F120；F119 文献标识码：A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历史使命与时代重任。关于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亦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从西方经济学说中批判地汲取有益的理论成分，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探讨代表性西方经济学说，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学理关联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但有助于厘清这些学说在中国推介与传播的阶段特征，还有助于深入理解其传播过程中的理论取向及潜在的现实价值。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中国经济思想史特殊学科”项目

作者简介：缪德刚（1984-），男，山东东营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与发展经济学研究。E-mail: ndg2016@126.com

斯密经济思想随着《国富论》的出版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并成为中外经济思想研究的重要关注领域。刘瑾玉^[1]的统计表明,迄今为止,仅汉译《国富论》就有42个版本,其中37个版本是2000年后翻译出版的。1901—1902年首部汉译《国富论》以《原富》之名出版后,就陆续出现了围绕《国富论》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后,涉及汉译《国富论》的著述数量可观。赵靖^[2]、胡寄窗^[3]与朱绍文^[4]关于《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成果中,以围绕严复汉译《原富》的讨论数量最多,此类研究主要涵盖于严复经济思想的梳理中。近年来,赖建诚^[5-6]与张登德^[7]围绕《原富》在中国近代传播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包括严复翻译《国富论》的背景、《原富》中的误译与曲解,以及所涉汉译经济学概念术语、思想文化的影响等方面。以往主要是基于《原富》案语研究严复经济思想,刘瑾玉^[1]通过严复手批《国富论》英文底本对《原富》中的案语进行了专门考证,解决了《原富》案语来源不清的问题,值得学界关注。

《国富论》系统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等著作,可以说是《国富论》的衍生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同样批判性借鉴吸收了《国富论》中的理论元素。从《原富》出版算起,《国富论》在中国传播已有一百二十年。朱绍文^[4]认为,这一百余年间,《国富论》除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得以存在,未见其在经济学界产生其他实质性影响,更遑论对斯密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体系的全部思想予以探究。可见,《国富论》及斯密经济思想作为代表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有必要对其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予以梳理和探讨。

一、经济学:随《国富论》入华的“未定名之学”^①

19世纪80年代,丁韪良、艾约瑟、傅兰雅分别编译了《富国策》(1880年)、《佐治刍言》(1885年)、^②《富国养民策》(1886年)。这三本书的英文原版分别为英国学者编撰的经济学类通俗性著作,斯密关于分工、资本和工资等学说在其中有所介绍。20世纪之前,斯密及《国富论》在中国的流传虽不系统,但已被有识人士知悉,且当时的针对性评述带有向西方学习的献策意味。

^① 考虑到当前的表述习惯此处用“经济学”,严格来说,用“经济科学”更为准确。当前的“经济学”包括经济思想史,而18世纪末以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20世纪以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都包含“非科学”的成分。但“非科学”不等于“无价值”,“科学化”或许是经济思想演进的一个方向。同样地,过去未“科学化”的经济思想不代表将来不能被“科学化”。

^② 《佐治刍言》底本作者系英国历史学者约翰·希尔·伯顿(John Hill Burton, 1809-1881),原书名为《政治与社会经济学》(*Political and Social Economy*),出版于1849年。1852年,钱伯斯出版社(W. & R. Chambers)再度请约翰·希尔·伯顿撰写,并以《用于学校和私人教学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for Use in Schools, 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为名出版。

1897年，严复开始着手翻译《国富论》。1901年，南洋公学译书院铅印出版了《国富论》前两篇计20章，并于次年出齐，书名定为《原富》。《原富》出版后随即得到《新民丛报》的推介。推介人认为，该书“文笔太务渊雅，可以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同时希望严复“将所译之各名词列一华英对照表，…著叙论一卷，略述此学之沿革”。^①后来，严复编写了斯密的生平简介，吴汝纶撰写了序言。吴汝纶^⑧在序言中批判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讳言利”“重农抑商”的陈说故见，称赞严复翻译此书正当其时。张菊生、郑雅辛二人则辑录了中西年表及译名对照表。这一时期关于《国富论》的著述侧重介绍，即使《原富》刊行后相关讨论依然寥寥，这或许与《新民丛报》^⑨所指出的《原富》一书“义博理奥，初学者未易领悟”有一定的关系。

尽管如此，《原富》的出版促进了经济学概念汉语化表述范式的形成。19世纪后期传入中国的英文经济学著作名称中多夹带 Political Economy 一词，当时常将其译为“国宝学”“理财学”“理国之法”“治国之道”等。20世纪初期，赋有科学涵义的 Economics 被国人了解并逐渐成为“经济学”的对应名词。该时期的文献将“计学”“理财学”“平准学”“生计学”等译称趋统于“经济学”。然而，严复认为，Economics 译为“计学”更贴合其本义，译为“平准学”“经济学”皆不妥。^②“经济学”原本是日文中针对 Political Economy 的译法。^③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思想家孟克列钦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里以“经济学”替代了“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用法从此广为流布。Political Economy、Economics 中文译法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呈现科学化发展趋向，另一方面说明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一度受到日本学界的间接影响。

20世纪20年代是学术界讨论斯密经济思想的峰值期，每逢斯密或《国富论》纪念年份皆有文章刊载，甚至斯密生卒月份也有纪念文章发表。如1923年正值斯密诞辰200周年，《东方杂志》《学艺》分别刊发了相关纪念论文。以《国富论》出版150年为契机，1926年《东方杂志》再度发表纪念文章。同年，刘秉麟撰写的《亚丹斯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分四章介绍了斯密的生活环境、经济思想渊源、生平及著述和《国富论》中的学说等。从经济思想领域看，20世纪20年代的专题著述主要探讨了《国富论》的理论构成，涉及斯密关于价值、工资、租税等方面经济思想，使之在中国得以广泛推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作者绝大部分有海外研修经历，他们的研究参考书目不是完全依照汉译版《国富论》，而是通常直接使用麦卡洛克、罗哲斯和坎南等人校订的英文版《国富论》。

^① 此文的作者为《新民丛报》的实际主编梁启超。

^② 严复所指的“计学”是 Economics，且他在此文中特意强调，“此科最新之作，多称 Economics 而删 Political”。

^③ 梁启超在1902年第1号《新民丛报》上介绍《原富》时，以“理财学”指代 Political Economy，而非后来严复1902年第7号《新民丛报》上答复前文时用“计学”指代 Economics。可见，梁启超所谓的“理财学”与严复所指的“计学”并非同一英文词的汉译名。

1930年，黎明书局出版了唐庆增著作的《西洋五大经济学家》，主要介绍了斯密、施穆勒、马克思、博姆-巴维克和杰文斯等五位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其中对斯密的介绍，包括其生平、分工学说、价值及分配论、财政理论以及学术影响等方面。20世纪30年代，郭大力和王亚南鉴于《国富论》在经济学界的巨大影响，并为翻译《资本论》作理论储备，二人在翻译《资本论》前首先合译了《国富论》。此外，刘光华留日期间编著的《国富论》解说书也同期面世。《国富论》陆续取代了严复版本的译名《原富》，早先广泛使用的“亚丹·斯密”也被“亚当·斯密”所替代。然而，自30年代末开始，国内学界围绕《国富论》的讨论逐渐减少。1936年《国富论》出版160周年之际，《食货》杂志仅征集到3篇论文，且1篇为译文。20世纪40年代仅有少数《国富论》或斯密经济思想专题著述发表。与此对比鲜明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经济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中文经济学出版物数量由此大幅增长。然而，与此前重视介绍经济学说不同的是，经济学界更热衷于结合中国现实问题寻找理论对策，而对包括斯密经济思想在内的经济学理论的关注度明显降低。

经济思想是基于现实经济问题而形成的理论概括，系统化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思想的凝结。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种资源^[10]。中国近代经济科学的启蒙源于外来经济学说的传播，《国富论》无疑是早期重要的传播媒质之一。结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演进历程来看，《国富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种理论要素在中国时代背景和实践环境下的演化。回溯《国富论》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理解，同时对于辩证看待、汲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有益思想资源，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启示意义。

二、近代学者围绕《国富论》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

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著述内容涉及《国富论》思想来源、回应斯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论述、《国富论》版本问题和比较分析斯密经济思想等方面。近代学者对前两个问题的关注，较为直接地体现了中国人早期认识以《国富论》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方式，即前者涉及中国思想文化对斯密经济学说形成的影响，从学理上拉近了中国思想文化与西方经济学说的关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蕴含的经济学理论基质值得审视；后者则是基于《国富论》涉及的现实经济问题，凸显了以斯密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者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面临不可避免的时空局限，以致部分观点后来受到了中国学者的质疑。

1. 关于《国富论》思想来源的讨论

中国近代学术界围绕《国富论》思想来源的讨论，受到了“斯密问题”的影响。1878

年,德国历史学派的斯卡尔钦茨基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及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中指出,斯密赴法国前受哈奇森、休谟的影响成为理想主义者,在法国期间受重农学派的影响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由此造成了《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中人性论的对立。19世纪中叶以后,围绕《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中的人性论是否一致问题持续争论了大约一百年。^①该问题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斯密问题”。

从“斯密问题”引申出的议题是,斯密是否受到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经济学说史研究者也参与了讨论。20世纪初,坎南^[11]在其修订的《国富论》序言中指出,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演讲稿内容并未体现出他对于重农学派的认识,也未带有重农学派理论的痕迹,然而在《国富论》中却有很多重农学派的思想。这说明,斯密受重农学派影响是在担任“道德哲学讲座”教授之后,且未著《国富论》之前。

《国富论》在中国近代传播期间,国内外学界对斯密思想来源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斯密思想体系的转变缘于他在法国旅行期间受到重农学派思想影响,欲了解斯密经济思想的渊源必须通晓重农学派学说的主旨;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富论》中的思想体系继承了英国部分学者的经济思想,即大多以格拉斯哥大学演讲稿为底本,而演讲稿写成于斯密赴欧洲大陆旅行之前。20世纪30年代,关注该问题的中国学者大多认为,《国富论》受到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影响,但该书主要脱胎于斯密演讲稿的第四部分,这部分内容与哈奇森讲义的第三部分内存在诸多相同点。可见,当时学界对《国富论》部分思想来源的认定并不完全一致。

近代中国学者对斯密是否受法国重农学派影响这一议题的关注,旨在探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否对西方经济学说发展产生过直接影响,以此彰显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理论价值,乃至探索向经济科学注入中国元素的可能。18世纪,欧洲思想家曾将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伦理作为反对宗教神权的理论工具,构建了以人性自利为代表的“道德哲学”,实现了由宗教伦理向经济伦理的转型。事实上,法国重农学派学说源自中国经济思想这一议题是西方学者最先提出的。1902年,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奥古斯特·翁肯在《国民经济学史》中,论述了法国重农学派与中国学术思想的关联。20世纪30—80年代,许多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影响进行了系统考察。^②众所周知,重农学派的几位重要代表人物十分推崇中国思想文化,尤其是魁奈,不仅撰写了论述中国经济问题的专著,还被誉为“欧洲的孔子”。部分近代学者如熊子骏^[12]秉持杜尔哥所著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系《国富论》的底本一说,李永霖^[13]论证这本书原为当时留法的两位华人高类思、杨德望所作。

对于斯密经济思想是否受到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影响这一议题,坎南^[11]曾指出,“关于

^① 实际上,德国历史学派对“斯密问题”的观点也非统一。1874年,翁肯在《斯密与文化史》中坚持历史学派的观点,但次年转而认为斯密的思想具有统一性。

^② 谈敏所著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199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关于该问题最为系统性的成果。

斯密氏的见解之来源，我们可毋庸再加研究，恐怕我们经已研究得太长了”，在 1749—1776 年期间，“一般经济思想，业已横断英吉利海峡很多次，故此讨论这些思想进步发达的情形，无论怎样争辨，或英国的贡献，抑或是法国的贡献，殊属无用”。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斯密问题”本质上是因为不了解斯密早期著作产生的伪命题。^①德国学者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和斯卡尔钦斯基先后对这一问题进行解读。此外，朱绍文^[14]指出，中国学者对“斯密问题”的间接关注，还有可能源于苏联，而苏联亦受到德国的影响。“斯密问题”的出现也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在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至马克思所认为的庸俗政治经济学阶段以后，由于缺乏较大的理论创新，致使一些后续议题拘泥于既有的理论范畴。仅从这一点上说，尽管中国近代学者对“斯密问题”的讨论主旨在于彰显中国思想文化要素的学理价值，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西方中心问题意识的窠臼。

2. 关于《国富论》所涉及中国经济问题的回应

《国富论》在英国出版后，随即得到一些读者的积极评价，但也有人对书中的部分观点持否定态度。即便在斯密逝世后，围绕《国富论》的质疑仍时有发生。斯密在该书中立论时，有 5 篇 14 章计 23 处引证了中国的经济现象。但他未尝到过中国，主要参考了西方旅行家、传教士的部分记述，以致后来有不少学者指出，斯密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了解不够充分。斯密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已达到既定制度下财富增长的极限。由此，绝大多数研究者将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 18 世纪的中国解读为一个经济陷入停滞的案例。斯密在讨论分工、工资、地租、资本、对外贸易、财政等问题时，均提及中国的经济状况作为例证。《国富论》在中国传播以后，近代学者梳理了斯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并对其观点进行了回应。这些回应涉及内外政策、劳动者工资等方面。

在内外政策方面，斯密认为，中国农业发展起步早且市场大，但后来却陷入经济停滞。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财富积累源自土地耕种，农业较其他行业更受重视，农民的社会地位高于手工业者，而对外贸易相对被动。在他看来，中国的重农观念是错误的。这种重农观点将手工业者、制造业者以及商人视为不生产阶级。而手工业者由于还受到商人盘剥，很难把赚取的利润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麦卡洛克^[15]认为，斯密对于中国不重视贸易的说法值得怀疑，中国曾借助戎克^②和船舶与菲律宾、日本、暹罗（今泰国）等国进行大规模贸易。邹幼臣^[16]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自秦汉时期就开始对外贸易，唐宋元时期航行于红海、太平洋的船只多数来自中国，明时期海外贸易兴盛，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这些都是中国注重对外贸易的表现。

在劳动者工资方面，斯密提出，在一个长期停滞的经济体中，通常劳动者很难获得较高

^① 20 世纪初，日本学者曾对“斯密问题”及“法国重农学派学说中国渊源”问题有过相关研究。中国近代学者的相关讨论也可能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20 世纪初，藤井健治郎曾论证了《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思想体系的一贯性。1931 年，泷本诚一在《欧洲经济学史》附录中阐述了“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

^② 戎克即中国式平底帆船。

的工资，并以中国为例证。对此，袁问不^[17]认为，中国工资低是因为人已尽其才、物已尽其用，欧美国家没有发生工资相对降低是因为它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创新产能。斯密讨论工资问题时引证来自中国的事实，目的在于说明欧洲和中国分别存在重工轻农、尊农贱工的现象。劳动的需求通常受限于地域，中国人安土重迁，劳动工人流动性差，以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为此，李超桓^[18]指出，可以通过增进国家财富和限制人口两种途径，提高中国工人工资。

18 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即使农业生产能够自给自足，恐怕很难有充分的生产剩余来满足持续性的大规模对外贸易，进而带动经济发展。一般认为，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风险高、回报率低的特点，在同等社会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二者获得的经济收益自然不能等量齐观。尽管《国富论》被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标志性著作，但斯密在该书中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是从间接资料中归纳得到的。由于斯密所使用资料的陈旧与片面，造成了近代学者对其观点的指摘。当然，近代学者对斯密观点的回应总体上流于泛泛，少有系统化成果的形成。

三、《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作用与影响

“经济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期，重农学派更是自称为“经济学家”。尽管如此，重农学派及此前的经济思想家没有对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畴与分析方法作出可通约界定，未能实现经济学研究范畴的深化和分析方法的累积，其经济思想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18 世纪末，经济学在欧洲地区进一步系统化发展，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是其中的重要成果。斯密在此书中提出的价值学说、绝对优势理论分别奠定了劳动价值论、自由贸易论的理论基础，以劳动、资本、土地界定了生产要素的分析范畴，还融汇了重农学派的演绎法、休谟的归纳法与历史法。19 世纪末，经济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扩大，并最终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近代以前，中国本土的经济思想基本为独立发展，其渊源至少可追溯至西周时期。西汉中期，中国本土经济思想形成了以“重农抑商”“贵义贱利”“黜奢崇俭”为代表的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传统经济思想。受限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一经济思想未曾成为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没有与其他思想文化分离，也未能从前人的价值观念中独立，缺少在研究范畴和分析工具的重大创新，以致最终陷入停滞。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家辈出，他们在生产、交换、分配等领域提出了无数新见解，给魁奈、斯密等人的经济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该时期开始，中西方经济思想在现实解释力方面出现显著差别。

鸦片战争后，国人对传统思想意识与社会价值的质疑日益增长。龚自珍、包世臣、魏源

等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进而为西方经济学说的在中国传播,以及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型消除了思想障碍。洋务思潮、重商思想、工业化潮流的兴起则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关心的经济问题不再是评判追求财富是否正当,而是采用何种方法实现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这种理论需求是当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不能及的,吸收西方经济学说成为解决理论困境的关键途径。19世纪后期,《国富论》即被摘编、翻译为中文。一本英国学者所著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能够在一百二十余年后出现在中国,其现实原因在于,近代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原富》的译者严复认为,此书中描述的英国经济状况与当时中国类似,中国若仿照书中的经济政策同样可以变贫为富。然而,不论是严复翻译的《原富》,还是后来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国富论》,均未能让旧中国实现富强,但《国富论》及其作者斯密的经济思想却成为国人了解西方经济思想的窗口,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前提性要件。

《国富论》传播到中国后,中国学者积极从本土的传统经济思想中寻求与斯密经济思想相近的元素。斯密主张放任经济组织在既定制度下参与经济活动,以此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那些受过自然主义观念浸染的士人同样有关于顺应经济组织自然发展的论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司马迁的“善因论”。严复就曾引证司马迁的“善因论”解释斯密的自由放任观念。但在《原富》一书的案语中,严复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比附斯密的经济学说,造成了不少理解不当之处,如将法国重农学派主张的土地单一税错误地比附为明代的“一条鞭法”。也有其他观点,如勇立^[19]认为,王船山金银非财富论、价格学说、贸易观等领域的经济思想与斯密类同,或如鲁深^[20]指出《大学》中的理财观念与斯密提倡通过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的看法相仿。

在《原富》的《译斯氏〈计学〉例言》中,严复将西方经济学者常用的“归纳法”“演绎法”分别译为“内籀”“外籀”,并指出经济学分析方法在西方经济学说中的演进趋势,“计学于科学为内籀之属。…如斯密、理嘉图、穆勒父子之所论著,皆属此类。然至近世如耶方斯、马夏律诸书,则渐入外籀”。^①作为媒介之一,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国富论》初步领会到经济学说在欧美国家的演进情况。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思想在传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学学科体系在中国日趋成型并得以完善,一批学者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分解出经济思想,进而使中国经济思想史逐渐成为本土经济学的子学科之一。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在“经济科学”领域内经过反复地探讨与诘问,经济学本土化的重心逐步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综括近代相关讨论来看,《国富论》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科学化转型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涉及中文经济学表述术语的使用与规范、中外经济思想的解读和比较,以及从经济学理论视角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等。《国富论》带来了早期经济学话语要素,至今仍一定程度上

^① “耶方斯”即威廉姆·杰文斯,“马夏律”即马歇尔。事实上,发扬《国富论》中演绎方法的经济学家首推李嘉图。另外,严复最早将“归纳”(Induction)译为“内籀”、“演绎”(Deduction)译为“外籀”是在《天演论》一书的《自序》中。

影响着经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及学术体系构建。

四、对于《国富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再认识

1. 《国富论》的时代局限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形塑

《国富论》完成于工场手工业时期，尽管此前重商主义思想及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但封建统治阶级与极端的保护主义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而满足广泛需求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经济问题。直到18世纪后期，关税仍然是英国的传统经济政策之一。斯密基于分工理论认为，自由交换可以增进贸易双方所得。19世纪初期，斯密的经济学说被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用来抨击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为英国拓展世界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持。海外贸易的开拓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给殖民地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传播到欧洲大陆之后，其主张的自由贸易理论一度受到追捧。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识到，对于像德国这样工业落后的国家，既没有工业生产剩余，又缺乏充分的农产品，只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很少的利润。在外来工业品的冲击下，德国产业必将破产。因此，李斯特不赞成自由贸易学说，主张德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提出经济发展阶段说，肯定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国富论》中的自由贸易主张同样不适用于内外交困的近代中国。绝大部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这样的认识，而通过回顾《国富论》在中国传播历程可探寻其中的转变印迹。^①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断从中国攫取经济利益，使中国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的瓦解。在此社会背景下，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主张向西方学习，工业化思想成为主流经济思想。19世纪末期，中国兴办的新式工业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阻碍，严复通过翻译《原富》旨在表明应当顺其自由发展。^②20世纪20年代，学界对《国富论》的关注与讨论，实际上是民族资本得到短暂发展契机后于思想领域的映射。

斯密经济思想虽备受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国家所推崇，但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性和本土情境，因此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格格不入。随着《国富论》在中国越来越“水土不服”，

^① 从1901年出版的第2、3、4、8期《译书汇编》来看，李斯特的著作《理财学》（原名《经济论》）即被留日学生以连载的方式译成中文。这种翻译是将其经济学说视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互补性学说而呈现的。

^② 赵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续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指出，严复选择了《国富论》而没有选择他认为代表当时新水平经济学的著作，原因在于，“他认为，斯密用以批判重商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适合于中国当时反对清政府阻碍经济发展的弊政，特别是反对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的需要。”

聚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进而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指导中国先进分子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十月革命的爆发，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解救中国的指导思想。正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面对强大的外来资本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终究难以独立发展壮大起来。在此历史背景下，明晰当下面临的社会形态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重要问题。20世纪20—30年代，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最终塑造并奠基了早期的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这场论战发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参与争论的涉及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中国共产党内外、中国左翼思想界与知识界，论战参与各方只使用马克思主义一种理论工具。前期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主要涵盖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社会史论战两个问题领域。前者是将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应用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分析，进而成为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后者则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前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性质的概括，由此形成了社会史论战。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瀚笙、薛暮桥等人对农村问题的讨论，将社会性质论战延伸至中国农村社会问题领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由此成为社会性质论战的一部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明确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总判断。这一判断的形成，明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李红岩^[21]认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领域站稳脚跟。与马克思主义陆续被广泛接受形成对比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对包括《国富论》的关注呈现出下降的态势。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学界逐渐对以《国富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有限适用性形成了清晰认知。

2. 《国富论》所涉及中国论点的理论及实践回响

《国富论》被公认奠定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畴与分析方法，由此成为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标志。因此，郭大力和王亚南^[22]将《国富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视为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预备。经济学说史上的很多经济学理论都是在解读经典文献的过程中产生的，《国富论》当然能为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国富论》等经济学著作传播到中国后，本土经济思想突破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藩篱，进一步发展为两条路径，其一是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承袭、质疑与批判，其二是进一步引进、复述西方经济学说。由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当时已陷入停滞，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势头日趋明晰，中国经济思想呈现出过渡性质。但当今的大多数经济学者未能充分意识到该时期经济思想史的理论价值。不论是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反思，还是复述外来经济学说，都并非毫无意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在接触到科学化的经济学之后，才萌生了对经济思想自身发展规律的梳理总结。1902年，梁启超在编写了西方经济学说史著作《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后，还打算另著一本《中国生计学史》，因而被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先驱者。可以说，最具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是近代学者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反思衍生品，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形成成为本土经济学发源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富论》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启蒙中国近代经济科学的角色。随着西方经济学说的不断引进，中外经济思想此消彼长，最终促成了 20 世纪 40 年代关于“中国经济学”探索。而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实质，是中外经济思想碰撞之后，再与本土社会经济问题结合的时代产物。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学说的早期学习与引进，王亚南、刘大中、马寅初、马哲民等一批学者未必会发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呼吁。遗憾的是，相关学者的探讨并没有结出实质性理论硕果，其背后的原因值得参照《国富论》学说架构予以深思。

至斯密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平台阶段。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第九章中指出，制造业的发展仰赖于分工，而分工的程度受市场范围的支配。中国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足以支持制造业的发展，并能深化分工程度。斯密的分工学说在当前理解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或许更合时宜。虽然多次抨击中国不重视对外贸易，但他同时指出，如果同时重视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中国将大幅改进自身生产力。从这些观点来看，斯密并不全然认可自由放任，而认为应该通过法律和制度手段对经济进行有条件地干预。实际上，斯密的放任主张主要针对工厂手工业时期的生产者。斯密逝世后，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社会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然而，生产者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和剩余价值，造成产能过剩，以致经济危机频发。

20 世纪 90 年代，黄宗智^[23]将 18 世纪中国经济进入的平台期归结为“过密化”状态。对此，王国斌^[24]认为，18 世纪欧洲和中国皆为斯密型增长。与 16—19 世纪中西方经济“大分流”观点相吻合的是，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的国民财富总量水平约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英国的六分之一。唐庆增^[25]的早期研究显示，美国经济学家米切尔按照工商业发达程度将世界各国分为三等，当时的中国位列最后一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中国逐步放开对生产要素流动的约束，并通过积极参与和推动自由贸易，实现了国内外生产要素的整合与优化配置，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2021 年中国 GDP 超 110 万亿美元，继续位居世界第二位。当代中国已然突破了《国富论》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长期不发展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突破与创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学界开始加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探索构建本土经济学过程中，经济学理论一般性与现实问题特殊性之间的矛盾早已被经济学界重视。尤其在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推进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国富论》的汉译曾是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预备，因此，在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参考与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刘瑾玉.翻译、概念与经济: 严复手批《国富论》研究[M].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21.618-620.
- [2]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340-365.
- [3]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212-235.
- [4] 朱绍文.亚当·斯密与现代中国——纪念亚当·斯密逝世 200 周年[A].朱绍文.朱绍文集[C].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24-39.
- [5] 赖建诚.亚当·斯密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 [6] LAI C. Adam smith across nations: translations and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7] 张登德.近代中国学界对亚当·斯密的纪念与评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2):113-124.
- [8] 吴汝纶.《原富》叙[J].鹭江报(厦门), 1903(30):3-4.
- [9] 绍介新著: 普通经济学教科书[J].新民丛报, 1903(32):86.
- [10]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 2016-5-19.
- [11] Edwin Cannan.《国富论》序言(续)[J].黄菩生译, 社会科学论丛, 1929, 1(6):79-111.
- [12] 熊子骏.中西经济思想的汇流[J].大学, 1942, 1(11):30-66.
- [13] 李永霖.经济学者杜尔克 Turgot 与中国两青年学者之关系[J].社会科学季刊, 1922, 1(1):166-374.
- [14] 朱绍文.亚当·斯密的《道德感情论》与所谓“斯密问题”[J].经济学动态, 2010, (7):91-96.
- [15] 田中忠夫.亚丹斯密的中国经济论[J].何健民译, 时事类编, 1937, 5(1):122-143.
- [16] 邹幼臣.论亚当斯密氏对中国经济言论之不正确[J].经济商业期刊, 1941, (1):123-165.
- [17] 袁问不.我们对于西洋经济思想的贡献[J].商学期刊, 1930, (4): 65-73.
- [18] 李超桓.亚丹斯密之中国经济观[J].学艺, 1923, 5(7): 105-111.
- [19] 勇立.王船山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J].四川学报, 1907, (3): 1-3.
- [20] 鲁深.读《原富》和《国家经济学》的偶感[J].商职月刊, 1936, 2(1): 83-89.
- [21] 李红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溯源: 重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J].探索与争鸣, 2021, (6): 47-59+229.
- [22] 郭大力,王亚南.资本论[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0.682.
- [23]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24]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李伯重, 连玲玲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25] 唐庆增.论国富与民生[J].平论, 1946, (9): 4-10.

(责任编辑: 巴红静)

中国知网